

八 洋装虽然穿在身,容闳的心永远是中国心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传遍神州大地,激荡了天下华人的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早在一百年前,容闳就以自己的嘉言懿行,为这首歌曲作出了最为生动鲜活的注释。

容闳是系统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近代中国第一人。许多人都知道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西学东渐记》,介绍了他如何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的辛苦与艰难。其实,这本英文原著的书,按原名直译,应该是《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

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容闳写道:

一直由西方文明作为例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在一个东方人内心产生作用,使他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倒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岂不是怪事吗?这正是我个人的情形,然而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忱却并未因此衰减。

他继续说道:

积极推行我的教育计划,是我对中国的不可磨灭的热爱表现,同时也是我认为的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

容闳不无伤感地这样结束:

随着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撤销和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的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就此告终。

容闳的中国心,被中国的现实狠狠地刺得鲜血淋淋!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乡。父亲容明冠,母亲林莲娣,有子女四人,容闳排行第三。1838年,容闳随父亲来到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郭施拉的夫人创办的学校,学习英文,但时间很短。1840年,父亲去世,家庭没有丝毫积蓄,陷入非常困难的景况。为了帮助妈妈支撑起苦难的家,哥哥打鱼,姐姐做家务,十二岁的容闳四处贩卖糖果,每天早出晚归,能挣两角五分钱,全部交给妈妈,补贴家用。

因为懂一点英文,少年容闳得到去澳门工作的机会。先是在印刷所做月薪四元五角的折页工,后来又到医院帮忙,减轻病人的伤痛。

在合信医生的引见下,1841年,容闳进入美国勃朗教士主持的马礼逊学校读书。

1847年1月4日,十九岁的容闳在勃朗的帮助下,赴美留学。同行的还有黄胜和王宽。他们在一些外国朋友的赞助下,免费乘坐“女猎人”号运茶帆船,离开广州黄埔港,经过九十八天的航行,于4月12日到达纽约。他们先来到马萨诸塞州的蒙森预备学校补习功课。1848年秋天,因为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黄胜提前回国。1849年底,王宽去了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专业,后来成为广州的名医。

1850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热心的勃朗知道容闳家境贫寒,想帮他申请专为贫困学生设立的奖学金,但条件是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感激老师的好意,但拒绝了这种安排。因为,“这样做会妨碍和限制我发挥自己的作用。我需要行动上的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我固然贫困,但是决不能受贫困驱使,以我内心坚定的责任感作代价,去换取眼前的利益”。容闳决定自力更生,替同学办伙食,管理图书,靠勤工俭学的收入,支撑艰难的学习生活。

为中国谋福利的坚定的责任感是容闳刻苦学习的强劲动力。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消除了与美国同学之间的学业差距。容闳的数学成绩不太好,但是他在哲学与文学课程中表现优良,甚至战胜以英文为母语的美国名牌大学学生,

连续两年夺得英文作文的第一名。

作为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留学生,容闳人品高洁,学习勤奋,尊重师友,热心公益,与同学们相处和谐融洽,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小伙。耶鲁大学 1850 级共有九十八名学生,其中只有容闳一个中国人。毕业前夕,九十二名同学向容闳赠言,表达出浓浓的同窗情谊:“希望你未来的计划全都成功!”“祝你圆满完成为人民谋福祉的光荣使命。”思想激进的同学甚至题词:“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愿你回归天朝帝国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而你将参与获致推翻压迫的胜利”。容闳则以中国文化的经典名句相回赠,与之共勉。例如:

礼之用,和为贵。哈立司好友:你的灵敏机智和其他社交品质,将到处为你赢得朋友。我毫不怀疑你将以极大的努力去赢得胜利。你的愿望与目标将会圆满实现。

有志者事竟成。亲爱的司塔尔:你具有充沛精力和与生俱来的善心。大自然寄予你厚望,愿你能够实现你的崇高目标,为他人幸福而活着。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亲爱的旺:我将常常愉快地回忆起你的亲昵声调。愿你迅速进入广阔世界,为社会注入亲善与和谐。向你高雅的举止致敬。

身处康乃狄格州纽黑文市秀美宁静、古朴浪漫的校园内,容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却是祖国的悲惨景况。他时时自问:我所学的知识,用在什么地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容闳已经计划好了将来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1854 年 11 月,容闳大学毕业,谢绝了师友的挽留,毅然踏上归程。

几年间,容闳三番五次地调换工作,做过海关职员,还做过茶叶、蚕丝生意。他努力尝试自己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的人。

这时的中国,太平天国闹翻了大半壁江山。1859 年秋天,容闳和几个传教士一起,进入天京城内。他想实地观察一下,看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清王朝。容闳见到了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容闳向他建议,组织一支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设立军事学校,培养有才干的军官,组织文官政府,建立银行系统,规定度量衡标准,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容闳还表示,自己愿意为实行这些措施贡献力量。洪仁玕肯定了这些建议的合理与必要,但是说他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同意的决定。

容闳非常失望。他拒绝了洪仁玕送给的太平军四等爵位的头衔。在容闳看来,太平天国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新的政治理论或主义。“这次叛乱的唯一良好后果,就是上帝借助它作为一种动力,打破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

1863 年 2 月,容闳收到老朋友张斯桂的来信。这时的张斯桂,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在信中转达了曾国藩请容闳来安庆相会的邀请。

事情来得太突然,容闳一下子有点发懵。他甚至想到,是不是曾国藩知道我与太平军有来往,把我骗去杀头呢?但是,转念一分析,老朋友张斯桂断然不至于做出如此卖友求荣的龌龊事。推敲再三,容闳决定暂时不接受邀请,于是以茶叶生意正忙为由,推迟见面的时间。

两个月以后,张斯桂再次来信催促。信封里同时还装有容闳的另一位朋友、数学家李善兰的信。李善兰告诉容闳,自己曾向曾国藩总督介绍过老朋友急欲为国效劳的赤子之心,总督将委之以重任。

在容闳着手结束商务活动期间,张斯桂和李善兰等得心急,接二连三发信追问。这时的容闳终于确信了曾国藩的诚意。他意识到,有曾国藩这样的权臣做靠山,自己的教育计划,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1863 年 9 月,容闳来到安庆曾国藩大营,与张斯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老朋友见了面。容闳问道:曾国藩除了出于好奇心,想见见我这个喝了洋墨水的人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老朋友们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说,等你和总督见了面,自然就清楚了。

第二天,容闳见到了曾国藩。

五十二岁的封疆大吏上下打量三十五岁的留洋学生,这让容闳感到非常不安。

眼前的曾国藩神采奕奕，魁伟健壮，三角形的眼睑下，双目平如直线，淡褐色的双眸发出逼人的光。长髯垂胸，平添几分威严。

曾国藩问：“你在国外待了多久？”

“为了接受西洋教育，我离开中国八年了。”

“你愿意做个军官吗？”

“我从未学过军事，恐怕没有这种资格。”

“从眼神和外表看，你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

第一次短暂的礼节性拜访很快结束。曾国藩端起茶杯，表示送客。

容闳在曾国藩大营住了两个星期，天天和张斯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老朋友在一起。这些人摸透了曾国藩的心思，纷纷给容闳出点子，告诉他，下次再见到总督大人，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果然，曾国藩很快又召见了容闳。

不再客套，总督发问：按目前情况，应该怎么做，才能对中国最有利？

幸亏有前几天朋友们的主意打底，容闳搁置了直接谈教育的计划，而是从曾国藩最关心的军工事业谈起。他说：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普通的、基础性的机械厂。换句话说，就是应该建立一个能够由此再派生出许多类似的分厂的机械厂，由这些分厂再去制造供应特殊需要的机器，例如枪炮、机车、农业机械、钟表，等等。

两个星期之后，曾国藩通知，派容闳出国，购买专门机械师认为的最适合中国用的优良机器。至于到哪个国家购买，由容闳自己决定。

容闳不辱使命，从美国购回首批机器，为江南制造总局这个“好望角以东的最大兵工厂之一”的建设，立下头功。

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同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一所兵工学校。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容闳心中蕴藏十余年之久的教育计划，他为之激动不已。

1868年，容闳为推进“洋务”，提出四项建议，请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转呈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内容是：一、组织轮船股份公司，且不许外人参股；二、选派青年往外国留学，接受完善之教育；三、开发矿产资源，以间接提倡铁路事业；四、禁止传教士对教民行使任何审判权。容闳表白，在四项建议中，“我真正注重的是第二项，这是我唯一希望得到采纳的一项”。建议送出后，如泥牛入海。容闳心情不安地等待了至少三年，“一直盯住丁日昌，促使他经常

向曾国藩提起这个问题”。

直到1870年春天,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教案,容闳终于通过丁日昌说服曾国藩等几位钦差,同意联名奏请朝廷采纳自己的建议。迟迟延宕之后,这一年冬天,朝廷“着照所请”,曾国藩亲自将好消息告诉了容闳。容闳高兴异常,“这实在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对中国教育的设想终于成为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曾国藩召我前往南京,我们见面后作了派遣留学生的各项重要决定:建立一所预备学校;规定留学生的名额;筹划留学生在国外所需经费;规定留学年限”。

“出洋肄业局”设两名委员,由容闳和陈兰彬担任。陈的责任是督促留学生在美国继续学习中文,容闳的责任是照管留学生的国外教育,并为他们安置住处。两人共事,关系不太融洽。容闳评价他的合作者是一个“天生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

关于留学生的选拔规定,总数一百二十名,分四批出国,每批三十人。每年送出一批,连送四年。学生年龄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须出身清白,有人担保,通过中文考试和健康检查,录取后在补习学校学习一年,然后前往美国留学。十五年后学成归国。留学生每人来回旅费及衣物费用七百九十两银,学费、房租、伙食每年四百两银,全部由政府负担。如此优厚的待遇,还不用考什么“托福”、JRE,换在今天,肯定是争抢激烈打破头的事情,但在当时居然招不满额。容闳不得不亲自到香港,从英国人办的学校里挑选聪明学生充数,才凑足了首批名额三十人,其中二十四人来自广东,容闳老家的香山就有十三人。

几经周折后,1872年8月,一百二十名留学生中的第一批三十人,完成了在上海预备学校的培训,经日本横滨,赴美求学。此时,曾国藩已去世一年了。容闳深情地写道:“所有伟大事业的奠基者,往往由于自然规律的不许可,不能永年,在世时不能亲眼目睹自己所致力的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由个人行为 and 品德所产生的影响在他去世后却留存下来,并将永远存在。”

容闳亲自打前站,提前赴美,安排细致烦琐的相关事宜。他先后拜访了母校耶鲁大学校长泡特和康乃狄格州教育厅长诺滋鲁布,寻求支持。诺滋鲁布厅长建议,为了让中国孩子尽快通过语言、生活关,最好安排他们分散寄居在当地居民家中,每家两三人,便于互相照顾。等到孩子们英文水平达到熟练程

度后,再正式进入公立学校求学。

容闳非常感谢厅长的真心建言,决定把留学生事务所设立在距离康乃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二十多英里的春田镇。因为容闳的好友麦克林夫妇就住在这里,他们可以提供许多生活方面的帮助。但是,不久以后,根据诺滋鲁布厅长建议,为了学习的方便,留学生事务所搬到哈特福德城内。1875年,清政府耗资七万五千美元,在科林斯街三百五十二号修建了中国留学生事务所的永久所址。这是一栋三层楼房,设有办公室、教室、宿舍、餐厅,可供工作人员和七十五名学生使用。容闳希望,这将有助于留学事业的长久发展。可惜,仅仅六年之后,容闳寄予厚望的留学事业,就夭折了。这栋楼房,也由容闳夫人的哥哥经手,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出售了。

第一批留学生抵达哈特福德,容闳将他们两人一组,分散安排到当地的官员、教师或医生家中。美国朋友热情地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许多家庭都希望安排接待,但是因为人数太少,而未能如愿。

年幼活泼的中国孩子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快表现出他们的聪颖和顽皮。

巴特莱特教授家接待了中国孩子,后来出任清政府外务部会办大臣、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梁敦彦就在其中。教授的女儿路易斯·巴特很高兴来自异国的小朋友与自己玩耍。成年以后的路易斯·巴特小姐回忆:

当时以我的玩伴来看他们,他们富有青春活力,非常聪明能干,一般来说,只要我教会他们一种游戏,他们就会赢我。他们学英文非常快,初次见面时,我们交谈有困难,以后一点困难都没有了。等到他们进入学校,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们,他们读书进步很快,老师也为他们的成绩而骄傲。

中国孩子的到来及其出色表现,引起当地新闻媒体的关注。有报纸这样报道:

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崇敬他们,我们都以他们为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

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能够很快适应。他们还送给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

梁敦彦就是如此。1910年,他特别邀请路易斯·巴特姐妹来北京游览一年,盛情款待,奉为上宾。

留学生们除了进当地的中、小学随堂学习一般课程,每到周六,还必须回到留学生事务所,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内容包括参拜孔子牌位,诵读“四书五经”、研习国朝律例、操练中文写作、练习毛笔书法。事务所谆谆告诫留学生:“出洋本意,是令你们学习外国功夫,不是令你们忘记本国规矩,所以,功夫要加紧学习,规矩不可变更。至于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为了鼓励大家不忘文化本根,事务所明文规定赏格,对于中文作文、书法成绩优秀的留学生,按名次给予银元奖励。对不按要求完成作业的,给予惩罚。

按照规定,留学生们必须穿着中国服装,长袍马褂,蓄发辫,戴瓜皮帽。这一套行头坐在教室里上课当然问题不大,但是到了操场上,就太不合适了。尤其是十几岁的美国男孩,个个痴迷棒球。正当活泼好动年纪的中国孩子入乡随俗,马上也成了棒球迷。可长袍马褂怎么打棒球呢?于是,他们把严格的规定抛到九霄云外,换上运动装,欢蹦乱跳地打球去。

不仅衣服换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也在慢慢地变换。

留学生们住在美国人家中,吃美国饭,读美国书,天天和美国孩子滚在一起,耳濡目染,中国礼教的那一套,再也管不住年轻人躁动的心。有的人剪去了头上的发辫,有的人干脆皈依了基督教!

留学生们的这些变化,在容闳看来,正常得很。但是在传统保守的陈兰彬看来,却是数典忘祖、离经叛道的天大问题。两人为此屡屡发生争执。最后,陈兰彬干脆请假回国,一走了之。

陈兰彬回国后不久,清政府任命容闳为驻美公使,在官阶上是提拔升级了。但是,容闳真正操心的,还是留学生事业的发展。一旦去华盛顿任职,哈特福德的一大摊子事情,他实在是放心不下。于是,容闳向朝廷请求,自己仍然负责留学生的工作,职级情愿降为副公使衔。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实在:“在这件事上我应该为曾文正公(曾国藩)尽责,为国家完成一项伟大

任务。”

1876年,陈兰彬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公使。不久,他的随员吴子登接任留学生事务所监督。这吴子登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他与陈兰彬的态度一样,对留学生们适应并认同美国生活方式的种种行为忧心忡忡。到任后,吴子登对一切事情都吹毛求疵。更可恶的是,他还背着容闳,不断地向国内发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告,说事务所对学生管理不严,学生被容某放纵宠爱,游戏的时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有秘密结社的行为,声称如不采取措施,这些留学生将很快会“西化”成“洋鬼”,不但对国家无益,反而有害。这可完全不是朝廷花钱劳神费力所要达到的目的啊!报告送到李鸿章手里。李鸿章到底是眼光远大的政治人物,对这种“小报告”不予置理。

这时的容闳,还在一门心思地谋划留学事业的深入发展。他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请求允许中国留学生进入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美国军事院校深造,但是被拒绝。而这是违反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州出现了排华风潮。中国公使要求美方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但美方消极推诿。1880年,美国国会更通过排华议案,单方面修改了蒲安臣条约中有利于中方的条款。中美关系陷入危机。

在此背景下,陈兰彬、吴子登越发起劲地鼓噪,立即撤销留学生事务所。李鸿章这时也不好再支持容闳,他给总理衙门写信,通报了派遣留学生一事的来龙去脉,分析了留学生事务所或存或废的各方面利弊,而将最后的决定权,留给了总理衙门。

看到自己付出宝贵心血的留学活动即将惨遭腰斩,容闳非常伤心。他极力想挽回败局。一些美国友人也为此奔走呼号。耶鲁大学校长泡特亲自起草了给中国政府的请愿书,征得了大批教师、留学生监护人和社会贤达如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的签名。

请愿书写道:

获悉贵国将召回留学生、撤销事务所,我们作为学生的教师、保护人或朋友,深感遗憾。这些青年勤恳学习,品行高尚,谦虚有礼,风度文雅,所到之处,都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祖国建立了友谊。他们无负于他们的家庭和国家所寄予的信任。他们的学业,原可在精心灌溉和耕耘下培育

出灿烂的花朵和果实,但是这次变动,剥夺了他们的学习机会。

请愿书抗议:

现在未经照会和调查,突然永久性地召回留学生,我们认为这样做有损于贵国国体,对我们国家所给予学生的友好待遇也不够礼貌。至于你们所谈到的,我们的体制、原则和生活方式导致留学生走向邪恶而不是善良,则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

请愿书建议:

贵国任命卓越人才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此调查,辨明真相。

请愿书由美国驻华公使交给李鸿章。李鸿章确实想帮容闳一把,但是时势的发展终究令他无能为力。

1881年7月8日,总理衙门下令,结束留学生事务所,全体学生及工作人员立即回国。

这时,四批留学生中,第一批来美九年,第四批才六年。共有六十多人正在大学或职业学校就读,只有两人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们的是学铁路工程的詹天佑和学法律的欧阳庚。詹天佑后来以修筑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而闻名于世,欧阳庚1885年出任驻美总领事,做了一辈子的外交官。

8月21日,由享有“中国留学生之父”美誉的纯齐勒牧师主持,美国友人在巴特莱特教授家举行了惜别会。容闳和留学生及工作人员出席。

8月底,留学生约一百人(除去少数自愿离开留学生事务所的、提前回国的和个别去世的),从旧金山乘船归国。

9月的一天,轮船抵达上海。留学生们万万没有想到,祖国母亲竟然视远游归来的孩子如同罪人囚犯!

留学生黄开甲在给美国老师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回国后的遭遇:

为了防止我们脱逃，士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书院。跨进门槛，霉气扑面而来，似乎象征着我们的命运。

容闳则在《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这样评论道：

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中国官方给他们的待遇和他们在美国求学时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形成一种观念，即坚信西方文明远远胜过中国文明。这个观念给他们以充分理由坚决要使中国从根本上改革。

容闳说：

政府现在已经明白当初决定所造成的重大错误。后悔虽已为时过晚，但是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中国是真正觉醒了。

1881年秋天，容闳的驻美副公使任期已满。在回北京述职之前，他先去了天津，见到了李鸿章。

精明一世的李鸿章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开口就问容闳：你为什么把留学生召回来？

容闳大吃一惊，半天回不过神来，不知道李鸿章究竟是什么意思，只好推说陈兰彬通知皇帝的圣旨，我敢拒绝吗？我还要不要脑袋了？

李鸿章说：其实，我内心是赞成他们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你应该阻止他们回来。

容闳苦笑道：我在几万里之外，哪里知道您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如果您给个话，我当然会照办的。

停了半晌，李鸿章恼怒地说：我已经知道这是谁干的好事了。

容闳后来知道：为此事，李鸿章将吴子登好好地“修理”了一番。

在教育报国的美梦破灭以后，容闳依然关注着忧患重重的祖国，并力图为它做点什么。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容闳以前公使馆的同事蔡锡勇正在张之洞手下任职。容闳通过他向张之洞建议,向英国借款一千五百万美元,以此购买几艘铁甲舰,再招募五千外国士兵,从西太平洋方向袭击日本,为中国争取喘息时间,补充军力。张之洞同意了这个建议。容闳到了伦敦,直接找到公使,不到一个月工夫,就搞定了借款协议,但是需要以中国海关关税作为担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李鸿章拒绝提供担保,理由是税款抵押给日本以应付赔款尚且不足。容闳终于明白了,这李鸿章和张之洞向来不和,乌眼鸡似的斗个不休,借款之事,就此泡汤。

1896年,容闳萌生了在北京筹建一个国家银行的计划。他翻译了有关的外国资料文件作为参考,争取到老朋友张荫桓的支持。张荫桓这时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和户部左侍郎,他非常认真地与容闳讨论相关的细节问题,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张荫桓还将计划呈送给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希望通过他,争取皇帝的批准。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一个筹备委员会建立起来。翁同龢出面,给皇帝打报告,申请到一千万两白银作为开办费用。正当大家兴高采烈预备开张之时,翁同龢接到盛宣怀的一个电话,让一切鸡飞蛋打。盛宣怀这时是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神通广大的他不知从哪里得到这一千万两白银的消息,派人带着三十万两白银,到北京大肆“公关”,贿赂相关的王公权贵,居然是横刀夺爱,将开办国家银行的一千万两白银半道劫走。

容闳还是不灰心,他又全力筹备修筑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总理衙门屈从德国方面的无理要求,决定铁路不得经过山东。对这天大的不合理,容闳也就忍了。总理衙门还限制容闳,必须在六个月内筹齐国内资本,开工建设,不许借助外资,否则撤销筑路权。这就将容闳逼上了绝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当时靠本国资本来修筑七百英里长的铁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容闳苦涩的心早已是古井无波。因为,还在1881年留学生像罪犯一般押解回国之时,容闳就已经意识到:“毕生事业化为乌有。”

1912年4月21日,容闳与世长辞,安葬在康乃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的西达山公墓。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大大的中文“容”字的图案,向人们昭示着墓那永远眷念故国的赤子之心。